

# SARS 与中国社会

邓伟志等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 目 录

序.....	方明伦	1
对 SARS 的社会学思考 .....	邓伟志	1
SARS 是什么病? .....	王晓明	3
SARS 事件与公共领域 .....	葛红兵	9
SARS 事件中的政府、社会和公民 .....	章友德	15
SARS 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	张敦福	31
SARS 危机呼唤新的社会保障机制 .....	路学仁	42
从 SARS 事件看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紧迫性 .....	樊天霞 徐鼎亚	54
SARS 事件中的社会动员与志愿服务 .....	俞海薇	65
SARS 的一个经济学侧视 .....	陈 宪	73
从 SARS 事件看危机管理的对策 .....	陈祝平	95
SARS 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	王文华 谢远世	103
SARS 事件的负面效应和正面效应 .....	徐 瑾	110
SARS 防治的博弈模型和最优策略 .....	王惠萍	115
SARS 与生态经济 .....	张雅丽	124
审理涉 SARS 刑事案件的法律保障 ——两高办理涉 SARS 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解读 .....	严 励	135
SARS 防治的法律思考 ——浅议《传染病防治法》与《应急条例》.....	李 惠	144

SARS 与公民知情权 .....	王兴和	151
SARS 与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 .....	汤啸天	159
商业利益与公共健康的利益平衡		
——以与 SARS 相关的专利权为个案分析 .....	袁真富	170
SARS 与微生物及其基因的专利法保护 .....	杨望远	183
SARS 时期犯罪与防控 .....	岳平	190
紧急状态下人权的法律保护 .....	朱朝晖	196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几点建议		
.....	任青萍	204
“后 SARS”时期对医患纠纷的重新思考 .....	王琳	211
SARS 事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 .....	程竹汝 杜莲梅	222
对于社会谣言的哲学审视		
——由 SARS 时期社会谣言引起的反思 .....	陈新汉	231
SARS 危机与反谣机制 .....	夏耕	245
SARS 时期政府公共职能的特殊性 .....	叶景	253
应对突发事件还需架构良好机制 .....	吴德勤 周玉燕	260
行政干预预防 SARS 商品市场的必要性和合规性思考		
.....	饶年华	269
SARS 与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众认同 .....	顾晓英	275
弘扬抗击 SARS 的伟大精神 .....	沈鸿新	283
在抗击 SARS 中建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黄燕清	289
SARS 事件中传媒组织的功能 .....	宗明、顾均慧	294
SARS 报道与新闻客观性 .....	戴元光等	309
SARS 时期的中国主流媒体报道内容分析		
——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云南日报》、 《羊城晚报》为例 .....	课题组	323

# 序

方明伦

2003年5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解除对北京旅游禁令并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除名。至此,我们可说中国防治SARS战役在第一战场上已获决定性胜利,这个胜利值得我们庆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抗SARS战役实际上有三个战场,另两个战场分别是防治SARS科技攻关战场和反思SARS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战场。抗SARS战役的最后胜利取决于对SARS的科技攻关,如SARS疫苗的研制成功,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此次抗SARS战役中汲取教训,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进行理论反思,从社会观念和社会制度两个层面对防治SARS战役进行经验总结,进而对我们的社会文化结构作出合理调整。可以说,对SARS的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者不可偏废。

我校科研处深入动员、广泛发动,在较短的时间内组织了一支高效率的研究团队,以合作攻关课题组的形式分别从文化、社会、伦理、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不同角度对SARS这一突发性灾害事件展开分析和讨论,最终形成系列论文并集结出版,这一成果值得肯定。从这一成果中我高兴地看到,经过近年的大力建设,以硕士点的合理布局为依托,以博士点的建设为龙头,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非常活跃,具有一定国际国内知名度、学科结构科学、年龄梯队合理的文科科研骨干队伍。

当然,本书还只是我们对SARS问题的初步研究成果,这是研究的起步而不是研究的结束。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为国际国内学术界进一步思考 SARS 问题提供一个参照点,我希望以此为我国的抗 SARS 战役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 对 SARS 的社会学思考

邓伟志

这些日子,我跟大家一样忧心如焚。但是,作为社会学爱好者,我更多的是忧心思远,对思考 SARS 作社会学的思考。

SARS 是疫之一种。疫,同水、旱、震、风一样,都是灾。不过,这种灾又同水、旱、震、风不一样。水、旱、震、风等灾,均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而疫,从病毒来讲,是自然界。可疫的这种自然,是人身上的自然,是生理人与社会人集于一身。因此对疫的战斗必然包含更多的社会因素。SARS 正在引发出一大堆社会问题,唤起人们思考。我们应当拿出当年抗洪的精神来战胜 SARS,同时也应当看到战胜 SARS 比战胜洪水更为艰巨,换句话说,战胜 SARS 需要用更多的社会学理论“药方”。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患者与他人的互动。“互动”通常是好事,可在这里就成了交叉感染,成了坏事。社会学早就把“感染”移植成为学术术语,叫“社会感染”。为了避免感染和社会感染,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是把患者分散在各地治疗好,还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岛上治疗好?值得从长计议。请注意这里的“长”字。

其次,要研究灾度与心理的关系。灾度大小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刺激强度不一样。一般说,是有线性关系的:灾度小,人心定;灾度大,人心慌。对 SARS 患者需要找到特效药治疗;对健康者,包括不健康的、甚至患别种病的人,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这种心理治疗一定要是科学的,而不是生硬的。

第三,要研究 SARS 与社会化、社会流动的关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社会既有垂直流动,又有水平流动。如今是全球大流动,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的好处是资源配置更合理,是有福同享。可是,任何

事情都有二重性。有了有福同享,必有有难同当。这次的 SARS 分布三十多个国家,几乎是全球性的。一般说,开放度大的,社会流动频率高的,SARS 蔓延严重。这就要求我们有“两点论”。不止不行,不行不止。为防疫,应减慢社会流动的流速;暂时减慢社会流动是为了将来更好流动,切莫因噎废食。另外,SARS 的这种跨国性恰好有助于对灾害的比较研究,从而推动灾害学的发展。

“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灾害社会学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灾果。在每一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心不齐的会变齐,人品不高的会变高。在这次 SARS 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为,就很值得我们反复回味。像今天这样深受欢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今后如何推广开来,扩大人民的知情范围?SARS 迫使我们精简了不少会议。SARS 过后,能不能总结 SARS 时期的工作经验,把会议减少到尽可能少的程度?这些天公款吃喝少了。长期以来,几百个文件没堵住官员的一张嘴,现在一个口罩就堵住了。今后能不能把公款吃喝也减少到 SARS 发生期的地步?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半年不吃肉。现在每年公款吃喝几百亿元。我们从现在起,是否能开始把从筷子、叉子底下省出的钱,用来弥补 SARS 带来的损失?SARS 还在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社会交往少了,家庭团聚多了,SARS 过去以后又会怎么样?注意清洁了,洁癖也出现了,今后会怎么样呢?人们见面作揖了,不握手了,今后呢?

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灾,都有孕育期、发生期、消亡期三个阶段。但愿中国的 SARS 能够开始从发生期向消亡期转化,进一步降低灾度,缩短灾时,缩小灾域,化灾为利。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博导,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 SARS 是什么病？

王晓明

人类社会中没有“自然”的事情。40年前，中国的媒体所以会异口同声地称呼三年大饥荒为“自然灾害”，就恰恰显示了当时社会的某一种特别的政治文化。这一次的 SARS 事件也是如此：即便这病毒是来自天外，既非广东人吃野物吃出来的，也非国际阴谋战略制造出来的，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还远渡重洋、繁殖于欧美各地，就还是极为触目地凸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象。当然不止是病象，还有疗救的坚决的意志，也不止是中国的，还有其他国度、甚至整个人类的病象，但是，身为中国人，我首先看到的还是自己社会的病象，是一系列来自制度、也来自精神的病象。

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决定对策的，却总是那站得比较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它通常不会先落到那些高阶层者的头上）突然发生了，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一承认了灾难，自己就要吃亏，越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和良知，住在城里的高阶层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相信自己与居低位者得失不共、

于是本能地就要封锁突发灾难的消息的人，总是更容易滋生吧。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俗话亦云“屁股指挥脑袋”，广东那一位声色俱厉地指斥“谣言”的卫生厅长，还有中央那一位当众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恐怕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遵循了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来区别别人的逻辑，早已经随着各阶层生活之间的日益分化而蔓延开来。当 SARS 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简单，屁股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东，与我有何相干？这样的漠然由来已久，什么煤矿的瓦斯爆炸了，什么地方“毒米”吃死了人，这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民什么时候真正激动过？知识分子中间，又有多少人（不是没有人）为这些事情持续地深思、奋力地叫喊过？一直要到 SARS 在北京也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 SARS 不象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完了，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体对待，谁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它的背后，也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同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那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也在这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呢？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实之后：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一旦这样来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愤，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和这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什么是制度的病？这就是。

SARS 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看清楚 SARS 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本能反应就是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关闭

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谁能想到，在 21 世纪，老子式的“小国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在疫区的人，却有许多并不想做这样的“小国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 SARS 是免费的，就是口罩，那里的供应也最充足……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目前，也正是这样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胆战心惊。可以想象，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全国的许多省会上演，范围还很可能不断扩大。

从防治 SARS 的大局来看，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每个人都如一棵植物原地不动，流行性疾病才能够减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过，当人人都如此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承担的风险其实并不相同。要让人安心于“老死不相往来”，先得给他们大致相类的生活，如果你那里窗明几净、器械锃亮、医生成群，我这边却窗歪门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个社会，如果平时忽视公正、贫富悬殊，那到了危难时刻，就很难指望公众（无论贫富——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会献身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最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确有进步，至少许多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所谓“现代化”的标准看，是比过去明显提高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方面，社会的倾斜也逐渐加重，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上层和底层、新富人和新穷人……彼此的差异的扩大，真是相当惊人。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几年的不少行政决策：教育收费、乡镇“事业费”摊派、城市房价促涨、汽车和火车票提价……却总会令你记起古人“损不足以富有余”的警告。一面是广大乡村医疗体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却是医药费持续上涨、都市里接二连三地矗立起豪华的富人医院：这样的事情，才是破坏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现在医疗这一个领域。你是不是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制度的病？

或许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

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县,不就有好几位这样的官员被曝光了吗?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不是更有大批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也相信情况会是这样,真正的底层人民,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这些丢开职责、撒腿就逃的官员,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制度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会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期望:这不但是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期望似乎早已被视为愚不可及,一位相熟的美国人就曾对我说:“在美国,越是高层的人越不可信!”尽管如此,这一次 SARS 事件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颠预和冷酷,还是令我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了 SARS 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看电视实况转播,北京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就是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工人,都在力战 SARS,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问题是:这些人怎么会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教育再糟糕,也一定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关键只在社会的各种选择机制:行政官员的晋升、市场竞争的规则、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的评价,等等,能不能拔优汰劣,将这些人才挑选出来。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却是这些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

不远。150年前,龚自珍就是从人才的匮乏,觉出了满清由盛而衰的命运;100年前,章太炎更由封疆大吏的才质的一代不如一代,断言社会的崩溃不可避免。我当然愿意相信,今天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SARS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还是在SARS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有许多事情,既是制度造成,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除了种种制度之弊的逼迫,也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许多中上层的居民,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SARS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一、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可不要小看这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尽管他在公众场合不这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尽管嘴上还要说:“我们是朋友啦……”),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说到究竟,被崇尚实利的社会轻

视的事物，决不是真的可有可无，这一次的 SARS 的蔓延，就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应急机制的孱弱、医疗能力的匮乏、公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和唇齿感的淡漠了，所有这一切都以非常惨痛的方式提醒我们：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象 SARS 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SARS 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样防治 SARS，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导）

# SARS 事件与公共领域

葛红兵

今年是多事之秋,先是美伊战争,接着是中国 SARS。这两件事情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世界。美伊战争对二战后联合国体制是个考验,和萨达姆一起失败的不仅仅是前伊拉克政权,还有当下的联合国——在目前的体制下,它是否有愿望又是否有力量维护自己的尊严?这值得我们思考,无论如何,当下的联合国体制及世界关系准则正受到挑战,美英之所以能如此行事,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一方面是传统帝国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世界范围内对后二战体制、联合国当下制度的不满,因为这种不满,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世界公共领域,它正日益深入地影响着当下的世界格局,同样是这个公共领域在科索沃战争中也发生过类似作用。中国 SARS 事件也同样值得我们反思:在全球化日益成为现实的今天,内政在什么范围内必须尊崇世界化规则当作世界公共问题加以认识,又在什么范围内必须尊崇民族国家主权的要求在主权范围内得到确认?非常清楚,随着全球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世界经济和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传统内政观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内政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变得模糊和暧昧,它不再像当初那样明确,可以轻易界定,而 SARS 事件无疑给此问题带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实例。

读者可能会非常容易地看出,本文“世界公共领域”的概念借鉴自哈贝马斯“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但是本文作者并不试图在哈贝马斯原意上使用这个概念。本文作者使用世界公共领域概念是指因全球化格局而产生的世界公共舆论、公共意识、公共观念领域。本人作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产生了一个开放的世界公共领域,它已经由新型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全球化传媒、世界

化文学影视艺术生产、消费等共同组织起来,并在日益深入地通过建构世界共同意识而影响当代世界的基本政治构造。这个公共领域并不是哈贝马斯重视的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以及他所特地指认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遭到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工业社会中靠赢得公民投票维持的高度专制的公共领域”的算数和,尽管东欧的剧变使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存在空间,在某种意义上那种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正成为某种公共领域的最基本要素,但是,我所指认的“世界公共领域”依然不是以“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意识形态的。有必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德里达等欧洲知识分子复兴欧洲的企图,最近,哈贝马斯撰写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该文极具挑战性地提出了“核心欧洲”的概念,试图通过复兴欧洲来和美国抗衡,那么哈贝马斯所找到的那个“核心欧洲”到底是什么呢?哈贝马斯把核心欧洲看成是一种共同价值观念。首先,欧洲是由不同民族国家构成的,这些民族国家由于语言、文学、历史以及民族意识的不同而一度相互冲突,但到20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尊重差异性的趋势,这可望成为欧洲认同的一个基础。其次,如果说克服民族主义解决了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冲突问题,那么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则大大缓解了各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这样就克服了建立欧洲认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阶级障碍,相对美国而言,欧洲已经产生了许多共同的认同,比如欧洲社会的世俗化更加彻底,欧洲民众反对逾越政治与宗教的界限,欧洲人更加相信国家的组织能力和操控能力,而对市场的调节能力保持深刻的怀疑态度;欧洲对“启蒙辩证法”有着很好的理解,面对技术进步不是那么盲目乐观,欧洲人更倾向于社会团体处罚的制度规范,尊重个人人格的完整,并主张在控制与减少军事暴力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内政等等(参见曹卫东:《欧洲思想界又一次轰动之举》,《社会科学报》,2003年6月12日第7版)。笔者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论述哈贝马斯的“核心欧洲”观念,旨在说明,在欧洲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公共领域”的可能前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发生过非常

严重的学术冲突,但是,在推广“核心欧洲”的问题上他们却捐弃前嫌、摒弃个人恩怨联合了起来,这让我们看到在欧洲正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处于诞生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显示在更为广泛的世界空间,知识分子向公共领域进发为建构世界公共领域而可能有的作为。我们要看到“核心欧洲”概念的产生,意味着世界公共领域的新的可能性,尽管它戴着沉重的欧洲品牌的帽子;尽管这个“欧洲意味的”世界公共领域的拓展同时也显示了世界公共领域的内在矛盾,哈贝马斯等对欧洲公共领域的意见,不可否认,是以美国为假想敌的;不过笔者要在一个更复杂的层面把话说回来,在核心欧洲问题上,美国学者罗蒂等的支持显示,这个欧洲意味的世界公共领域在公共知识分子层面,获得了包括美洲公共知识分子在内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可,具有相当的普适性。经过上述分析,我可以结论性地说明的是当下诞生的世界公共领域其主体是世界公共知识分子,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并不是“自由主义模式的欧化或者美化的知识分子在主导着这个领域,更不是联合国、美国、欧盟或者日本、澳大利亚等政治力量在主导着这个领域,相反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现在,笔者要分析的是世界公共领域对中国应对 SARS 问题的影响。中国社会对 SARS 问题的重视不可否认受到了世界公共领域的影响,退休医生蒋彦永在此问题上采取的就是一个世界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他的影响不应当被忽视,他的意义如果在世界公共领域的层面上阐明就显得比较容易。网上有蒋彦永到底是民族罪人还是民族英雄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如果不引入笔者所界定的世界公共领域的视角,就没有意义,因为蒋彦永所秉持的并不是传统的民族主义或者世界主义的路线,而是我所说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的路线。中国社会面对 SARS 采取的种种措施,在蒋彦永之前并未及考虑世界公共领域的当下状况,因此我们会看到新加坡对政要推迟到中国访问以及在有关会议上拒绝中国建立相关基金的建议,新加坡的态度固然并不合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可以激发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引入世界公共领域这一视角的必要性问题。换言之,SARS 通过它在世界范围的迅速传播告诉我们,全球化时代已

经没有所谓的纯粹“内政”，一切内政同时也是外政，当代条件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把 SARS 当作一个纯粹内政来解决，同样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政策、军事政策、人权政策等等也是如此，世界进入文明史以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把人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的情势是：一个中国人上午在北京打的一个喷嚏就可能让远在加拿大、美国、菲律宾的人下午得上感冒。所以，一国政策的透明和民主不仅意味着要接受本国公民的监督，还意味着要更自觉地接受国际社会的检验和监督——自觉地在国际准则范围内活动：一国政府不仅要对本国人民负责，对他们开诚布公，还要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负责，和他们坦诚相见。世界公共领域的建构不仅对此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基本舆论框架来保证这一要求的实现。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是世界公共领域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的“核心欧洲”的动机是欧洲复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动机的“欧洲”民族主义色彩很浓，但是，我们看到正是这个欧洲动机竟然催生了一个具有广泛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基础的世界公共领域，它不仅构成了联合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基础，同时也成了欧洲公共知识分子和美洲公共知识分子联合的基础，它在数个方面可以给我们启示。民族主义的动机并没有过时，但是民族主义的动机完全有可能经过世界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化，成为世界公共领域的基石，世界公共领域的诞生为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转型提供了新的角度。原因是在世界公共知识分子那里，民族主义动机是以世界公共领域为目标的，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没有指向欧洲单边主义？而美国政治的民族主义动机催生了美国大国单边主义（帝国主义），原因是世界公共领域的核心观念在于对差异性的尊崇。对差异性的尊重构成了新的世界公共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观念的基本前提性共识。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传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部分，一是地缘民族主义传统（中国观念），二是种族民族主义传统（中华观念），三是政治民族主义传统（意识形态），这里并没有接近世界公共领域视角的思想传统，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的民族